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八个重大原则

程恩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本文结合分析学界的不同观点,阐述对八个重大原则的认识。

一、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而掌握先进科技和管理方式的人,对生产力起着核心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涉及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实体性要素,以及科技、管理和教育三大渗透性要素。其中,科技具有引领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功效;人口的生产应与物质文化生产相协调,由自然环境构成的自然力应与劳动力和科技力相协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初级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强调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的良性化,应构建“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的“三型社会”,高水平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关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思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是老动力不足,新动力缺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理念,实质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因而迫切需要

通过科技创新和领先来解决动力不足问题,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也只有重视知识产权优势,从企业、产业和国家层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才能围绕品牌、技术制高点及技术标准制定等构筑企业乃至国家的竞争优势。^[1]当前,在经济新常态的格局中,只有紧紧抓住创新这个发展第一动力,才能化解“三期叠加”风险,破解产能过剩难题,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跟上世界科技革命步伐。只有把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第一要务,以创新转换老动力,用创新培育新动力,使老动力焕发新活力,让新动力层出不穷,才能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应扭转“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以市场换技术”等传统观念,正确处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与引进消化再创新之间的关系。经济运行从“自发性”到“自觉化”的演进,要建立政府、市场、科技相结合的三元机制系统,体现出科技这一“决定性”元素的作用,需要在战略高度上认识科技引领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2]

二、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关于生产目的的理论。它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直接和最终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私人剩余价值或私人利润,生产使用价值是为生产私人剩余价值和或私人利润服务的。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直接和最终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生产新价值和公有剩余价值是为生产使用价值服务的,因而体现了“人民主体性”和民生导向性的生产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初级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又好又快地发展生产和国民经济的目的,便能缓解这一主要矛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要用进一步发展的方法来解决某些发展中的问题;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强调人民主体性,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惠及人民,改善民生就是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目的性原则和根本立场。

落实习近平关于“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内在统一的。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但是,发展生产和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改善民生,因而必须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攻坚目标,从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谋划财富和收入分配、扶贫、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七大领域的民生改善。要抓紧解决民生领域群众意见最大的某些问题,全力以赴,速补短板,限期缓解,这是新常态下民生导向性的生产原则和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工作。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实实在在帮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要从实际出发,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织密扎牢托底的民生“保障网”。

三、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生产不断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必然导致个别企业的生产经营有计划与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无政府或无秩序状态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生产经营的无限扩大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

的矛盾,导致生产和国民经济周期性地发生衰退和各种危机,以及贫富阶级对立和经济寡头垄断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因此,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初级社会主义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因而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化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强调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有别于私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果操作得法,公有制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有机相融,而且可以比私有制实现更高的公平与效率。同时,必须看到,在当今世界,国家政权还是一种必须存在的历史时期,国家所有制仍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

必须认真领会和坚决落实习近平关于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支柱、发展混合所有制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等战略思想和方针,汲取过去国有企业改革形成暴富阶层的严重教训,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双向混合的混合所有制,大力发展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提升公有经济的活力、竞争力、控制力和抗风险力。应牢固确立邓小平关于发展私有制的目的是为发展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基本思想。对于中外私有经济,不仅要支持,更要引导和监管,以发挥其正能量,减少负效应。依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华为企业的某些超前做法,我国应鼓励和引导私营企业开展职工持股的改革,以推动劳资两利,共同富裕。

四、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分配方式必然是按资分配,雇佣劳动者只能凭借法律上的劳动力所有权获得劳动力的价值或作为其转化形式的广

义工资。在这个大框架和前提下,雇佣劳动者在某一企业的具体工资与具体岗位和绩效挂钩,但这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按劳分配;而某些企业、某些部门和全社会的雇佣阶级总体工资状况,则取决于与资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及成效。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内的分配,表象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其实是按生产要素的产权分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初级社会主义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由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权制度,因而必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生产要素凭借产权的贡献参与分配这一基本分配制度;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内容;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用语);强调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产权贡献分配的机制。

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就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必须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只有将资源配置的目标着眼于共同富裕,社会生产才能健康稳定地运行,才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共享发展,主要涉及民生和共同富裕的问题,其中,分配问题当下最为突出。我国现在财产和收入的分配差距都比较大,基尼系数超过美国;1%的最富家庭已拥有我国家庭财产的1/3,与美国相同。要注意的是,贫富分化的第一指标不是收入。收入只是财富的流量,而关键是财富的存量,即家庭净资产。家庭净资产才是衡量贫富分化的首要指标。最近十几年来,党中央文件一直强调要“缩小收入差距”,但在学界和政界一直有争议,甚至有文章笼统地赞扬“富豪是经济引擎,也应是社会楷模”。一种极其流行的错误观点认为,目前贫富差距问题不是首要问题,不是由非公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所导致,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才是需要

担心的问题。事实上,正是发明“中等收入陷阱”一词的新自由主义导致拉美国家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导致高收入的美欧日国家陷入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低收入的非洲等国家陷入发展缓慢。现在,我国只有尽快落实邓小平多次强调的在20世纪末就要把解决贫富分化和共同富裕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指示,遵照劳动主体型分配原则改革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体制机制,才能真正使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落到实处,使广大劳动人民满意。^[4]

五、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或局部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矛盾运动的规律,其内涵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所占比例须符合社会需要,即同社会分配给这种商品的劳动时间比例相适应,且商品交换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而供求关系、竞争和价格波动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市场价值为基础,是价值规律的具体实现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中,按比例规律主要表现为整个社会内有组织的分工与生产单位内部有组织的分工相结合,按比例规律靠占支配和主体地位的计规律和占辅助地位的价值规律相结合来实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按比例规律主要靠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计划调节或国家调节作用较为有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本身包含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和按比例发展,要在国家调控主导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就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应贯彻习近平关于“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的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主要是在一般资源的配置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发挥作用的条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社会主义经济决定资源配置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需要将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从而形成高功能市场与高功能政府、高效市场与高效政府的“双高”或“双强”格局。^[5]显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包括人大、政府在内的整个国家从法律、经济、行政和伦理等多方面的调节力度和广度,必然略大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调节能力,从而可以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和高绩效。

我们不能因为国家规划、计划和调节是有人参与的,就否认其中包含客观性,进而认为“国家调节规律”、“计划规律”等概念不成立。照此逻辑推论,市场活动也是有人参与的,其主体就是人,那也就不存在“市场调节规律”、“价值规律”等相似的概念。市场调节说到底经济活动的自然人和法人的行为变动,也可以说就是企业的行为或调节,如产品、价格和竞争等方面的所作所为。因此,市场调节规律和国家调节规律都是在形式上具有人的活动主观性,在内容上具有人的活动客观性;良性而有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活动,要求在企业和政府工作的所有人,均应努力使人的主观能动性符合有人参与的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性,以便实现主客观的有效统一性。

六、绩效优先型的增速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绩效要互相协调,有较高绩效的增长速度是最佳速度;资源没有充分利用的较低增长速度,不利于充分就业、积累财富和提升福利,而资源粗放利用的较高增长速度,又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和积累真实财富;要辩证分析和对待国内生产总值

这一指标,它既有积极作用又有严重缺陷,不应过度追求;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效率、经济效益与经济绩效都是有异同点的,应突出经济发展整体绩效优先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绩效优先的速度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我国20世纪80至90年代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大体翻两番,而到2020年,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基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强调在高速增长30多年的情况下,从2013年开始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其标志之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重点是过去突出增长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突出经济绩效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

要切实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其原因主要在于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高度依赖物质投入和资源消耗,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迫切需要推动我国经济从速度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升级,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发展模式的创新、发展路径的转变、发展质量的提高。我国经济应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方式应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应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应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以便从总体上坚持绩效优先的速度原则。

七、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简称按比例规律)是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矛盾运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律。其内在要求是,表现为人财物的社会总劳动要依据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中,以便保持各种产业和经济领域的结构平衡;在社会再生产中,各种产出与社会需要在使用价值结构和价值结构上均保持动态的综合平衡,从而在既定的生产经营水平下以最小的劳动消耗来取得最大的生产经营成果;广义的经济结构协调表现为合理

化和不断高级化,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外贸结构、企业结构、技术结构、供求结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我国产业结构应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一、二、三次产业内部和之间在不断现代化基础上保持平衡,省市和区域结构应异质化发展,外贸结构应增加高新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企业结构应构建我国大型企业集团支配、中小企业和外资企业并存的格局,技术结构应增大我国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比重,供求结构应保持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动态总量平衡,金融发展应为实体经济服务,虚拟经济不宜过度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应相互协调。

要贯彻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经济新常态和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紧各种经济结构和重大经济比例的调整 and 改革,特别是加快缓解结构性产能过剩。要有针对性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要消除一种长期流行的错误观点,认为只需克服行政干预的经济过剩,而市场化形成的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是正常的,会自动平衡,不用事先、事中和事后来积极预防和解决。这种新自由主义谬论及其做法既是形成我国结构性产能大量过剩的重要原因,又会妨碍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看齐和落实,必须予以消除。

八、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依据国际分工、国际价值规律、国际生产价格、国际市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经济全球化等理论,在一国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经济适度对外开放,有利于本国和世界的经济增长、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和技术互动、人才发挥作用等;一国对外经济开放的方式、范围和程度等,应视国内外复杂多变的情况而灵活有序地进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开放更要讲求战略和策略,因为开放的实际综合利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自力主

导型的开放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我国要在自力更生主导的基础上坚持双向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互利共赢型的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强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并重的方针,大力发展中方控股份、控技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和控品牌(世界名牌)的“三控型”跨国公司,防止陷入传统的“比较优势陷阱”,实行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

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防止区域开放的雷同化和恶性竞争;要推进外贸优进优出,提高国际分工的层次,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妥善开展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充分利用中资和外汇储备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外资;要尽快借鉴日本、韩国和美国对待外国企业的经验和措施,防止外企在中国的“斩首”性兼并和支配日渐增多的产业部门和大众化网站等,大力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层次和绩效;要加快“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和建设措施,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要积极利用人民币的国际化优势,但资本项目近期不宜开放,以有效抵御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国民利益。

参考文献:

- [1] 韩喜平,周玲玲.“知识产权优势理论”评析及其应用价值[J].海派经济学:2013(03).
- [2] 杨承训,承谕.资源配置向“自觉化”演进:三元机制体系——学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再思考[J].海派经济学:2015(04).
- [3] 许友论.资源配置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J].管理学报:2015(05).
- [4] 卫兴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坚持、发展与创新问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10).
- [5] 刘国光,程恩富.全面准确理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02).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政治经济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戴群英